

# 人民情怀与人类命运——周恩来、池田大作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的内在动因探析

天津大学 杨卫芳 300350

**摘要：**人民情怀与人类关照是周恩来、池田大作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的内在动因与鲜明特质。首先，在中日政府间关系一度恶化的年代里，周恩来、池田大作因人民立场而相遇，共同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伟业；其次，在推进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池田大作从全人类的视角出发，以博大的视野审视中日关系，着眼于中日世代友好和世界和平。最后，周恩来、池田大作在全方位的推动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的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不仅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而且推动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从而呈现出“为人民”与“为人类”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人民情怀；人类命运；周恩来；池田大作；内在动因

周恩来所倡导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对日民间外交思想，不仅取得了有形的具体成果，即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且收获了无形的、更具深远影响的成效，即获得了以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为代表的日本社会高度认可和鼎力支持。剖析周恩来、池田大作良性互动的深刻内在动因，有助于总结蕴涵其中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探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效途径和广阔前景。

## 一、坚持人民立场的思想底蕴

坚定的人民立场是周恩来、池田大作互相合作的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为打破西方国家封锁，解决中日关系问题，深谙邻邦民情的周恩来独辟蹊径地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亲自指导中日之间的民间外交活动。这种信赖人民的态度，与在日本社会有着广泛群众基础，且有着丰富而深刻中国观的池田大作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共鸣，进而积极配合周恩来推动日中和平友好事业。在周恩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遇到阻力之际，挺身而出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入谈判阶段，派出以创价学会为母体所成立的公明党访问中国，为中日两国政府正式谈判扫清障碍。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者。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担任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直至1976年去世，开辟新中国外交局面，使中国走向世界，一直是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之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在开展外交工作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始终秉持着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的外交理念。尤其是在对日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从人民立场出发，系统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1957年4月15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并宴请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众议员浅沼稻次郎为

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中，阐述了依靠人民的力量推动政府，来打破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sup>①</sup>，强调两国人民感情上的接近、友谊的加强，是亲善的最可靠的基础。

周恩来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得到了日本社会人士的高度认可与配合，其中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和中国人民忠实可靠的朋友，池田大作对于中国、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同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一样，池田大作深知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因缘极深、恩德极大”<sup>②</sup>。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解读：“向民众学习、保护民众、为民众服务——在贵国悠久的前进的步伐中，有着辉耀世界史的历史，有着人本主义的特质，有着和平与和谐的伟大的文化力量。它一定会成为21世纪的路标，普照全人类。”<sup>③</sup>植根于丰富而深刻的中国观，池田大作把日中友好事业作为终生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并落实在行动中。1960年池田大作就任第三任会长后，创价学会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到1963年，创价学会会员由150万户成倍地增长到300万户<sup>④</sup>，分布在日本各界和各个阶层，并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系统、研究机构、文化团体、美术馆、和平研究所等附属团体等。“在当时的日本，创价学会已经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sup>⑤</sup>，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高度注意。

来自两个渠道的信息引起了周恩来对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的注意。首先是孙平化<sup>⑥</sup>在访日之后特别向周恩来所作出的有关于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相关情况的汇报。看过创价学会的历史、教义、组织机构、活动、会员社会阶层、财政来源等多方面的研究之后<sup>⑦</sup>，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了创价学会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的反战传统和会员来源，认为“和日本国内对学会表面而轻浮的共计截然不同”<sup>⑧</sup>。他对当时的外交人员做出了如下指示：“创价学会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团体，人数几乎占日本人口的一成。在推进日中友好时，不能忽视这个团体，要尽快同他们的干部接触。”<sup>⑨</sup>鉴于创价学会的宗教性质，周恩来希望中国佛学界的权威人士赵朴初能够通过宣扬佛法等机会，想办法与创价学会建立关系。真正第一次间接交流，是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sup>②</sup> [日] 池田大作：前引《新·人间革命》（第13卷），《国际创价学会通讯》No.2153。

<sup>③</sup> [日] 池田大作著，卞立强等译：《我的中国观》，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sup>④</sup> 《日中恢复邦交秘话——池田大作与日中友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sup>⑤</sup> 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21页。

<sup>⑥</sup> 孙平化（1917-1997），曾负责接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日本访华代表团，此后活跃在两国交流的第一线，自1986年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sup>⑦</sup> 据池田大作在《新·人间革命》（第13卷）中所说，当时，中国所能获得的资料，除了创价学会的出版物，便只有那些称创价学会为“暴力宗教”之类、把创价学会等同于德国法西斯的充满偏见的报道和批评。就这些材料做分析，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况且，中国还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国内关于创价学会的报告还是尽量防止片面之见，想得出更客观的结论。

<sup>⑧</sup> [日]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第13卷），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3页。

<sup>⑨</sup> 《日中恢复邦交秘话——池田大作与日中友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在日本著名作家、对华友好人士有吉佐和子访问中国之时。在临回日本之际。周恩来特意委托有吉佐和子转达他对池田大作访华邀请的口信。

几乎在周恩来高度重视池田大作及其所领导的创价学会的同时，创价学会也开始注意同中国进行交流。正如池田大作在《新·人间革命》中所说：“思索东方的未来时，不能不考虑到比邻的中国。他抱有坚定的信念：应早日恢复与日本的邦交，否则是两国人民的不幸。”

①1964年11月，佐藤政权登上历史舞台。他奉行“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加之此后不久，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日关系再度恶化、紧张。

可以说，在当时的处境，要推进两国恢复邦交并不容易。但是池田大作认为：“若不努力去真诚地与邻国友好，也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②于是，池田大作豁出性命在户田成圣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的11年后的同一天第十一届学生部总会上，向近两万名学生部进行了长达七十七分钟的演讲。由于演讲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提倡日中邦交正常化，因此，这次演讲又被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或《池田倡言》。《倡言》的主要内容是池田大作提出解决中日关系的三点重要方案。第一，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恢复中日邦交；第二，要为中国准备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让中国参加国际讨论；第三，广泛推进日中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以上三点，正是池田大作创造性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我们不难发现，池田大作在倡言中始终贯彻这一信念：亚洲和平、稳定的基础在于中国与日本的中日友好。要把二十一世纪变成和平的时代，除了两国的共同繁荣之外，别无它途。并且他认为：那永远持续的力量，正如周恩来所提示的“以民促官”，始终是在于民众！

值得指出的是，池田大作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刚一发表，就在中国两国之间引起巨大反响。这一消息立即就输入到了周恩来的信息网，为周恩来所了解。池田倡言的内容为周恩来所了解之后，周恩来对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在推动中日和平友好事业中的作用更加重视。1970年12月8日，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长野大学名誉教授菅沼正久时，除了询问“日本农业经济情况”③外，还特意向菅沼正久询问了“创价学会有什么特色”、“这个学会通常有什么样的活动”等有关创价学会的问题，谈了约30分钟。④在日本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为代表的各家报纸同时刊登了《池田倡议》，其中《每日新闻》除了正版的报道之外，还刊登了四版相关的评论报道。池田大作后来回忆道：

“我在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9月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时，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甚至可能断绝贸易关系，光是提及日中友好就会招来强烈的批评。站在今天的视角，当时的情况让人难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有一万数千名学生参与的集会上如此呼吁：“邦交正常化还牵涉到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难解。如果没有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和深厚的信赖，更重

① [日]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第3卷），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3页。

② [日] 池田大作：《2014年SGI和平倡言 变革地球的价值创造》，创价学会2014年编印，第3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页。

④ 《圣教新闻》，2000年10月23日。

要的是，如果没有希冀和平的共同愿望，那是不可能解决的……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能一如既往，仅以一个唯利是图的群体存在的。只有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为和平、为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地作出贡献，才配称为新世纪有存在价值的民族。”<sup>①</sup>

在此理念的指引之下，1971年公明党作为中日两国沟通管道访问中国时，池田大作对公明党所作出的一贯对华友好的指示，为公明党代表团明确了基本原则，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这一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相知互信，其思想根源，即在于他们秉持着同样坚定的人民立场。

## 二、关照人类命运的上下求索

推动世界和平是周恩来、池田大作携手奋斗的目标。系统考察和解读周恩来、池田大作的思想与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周恩来、池田大作所致力中日和平友好事业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具体结果上，而是有着更为高远的追求，蕴含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照。这不仅体现在他们从全人类的视野出发，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等种种框架的束缚，客观理性地审视中日关系，还表现在他们所追求的结果也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而是期待以中日世代友好为基础，实现世界的和平与亚洲的繁荣。而这种“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的人类情怀正是周恩来、池田大作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内在动因。

周恩来站在人类的视野下审视中日关系，明确提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和世界和平的目标诉求。历史地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民族亲近性上来看，中日两国之间都有很深的渊源，中日关系也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周恩来指出：日中两国的友好与合作，不仅对两国也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1950年3月26日，他在外交部全体班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介绍中苏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时就指出：“在东方，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要控制日本。它企图单独缔结对日和约，而中国和苏联却提出要共同缔结和约。日本人民懂得，单独缔结和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美帝国主义单独缔结和约的企图不成功，就想拖延和约的缔结，而我们却希望迅速缔结对日和约。”<sup>②</sup>因为：“中日两国如果真正友好相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完全独立，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sup>③</sup>并认为：“只要中国、苏联和亚洲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团结一致，把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那就一定能够制止美国在远东的战争阴谋，保障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安全。”<sup>④</sup>

<sup>①</sup> 池田大作：《2018年SGI和平倡言 掀起民众潮流 走向人权时代》，创价学会2018年编印，第47页。

<sup>②</sup>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sup>③</sup>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12页。

<sup>④</sup>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96页。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周恩来适时提出，要不断加深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方面、多层次、立体化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新局面。1972年9月，周恩来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表示：“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sup>①</sup>他表示：“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sup>②</sup>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周恩来明确提出：“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sup>③</sup>为实现这一目标，周恩来不仅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内容进行思考，更是不顾自身安危，为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具体途径提出：“第一步，请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到北京来，我们一起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或者叫做《联合宣言》，名称好办。总之发表声明是为了建交，互换大使，互相正式承认。第二步是两国经过谈判搞一个和约，不是简单的和约，而是搞一个《和平友好条约》，要比简单的和约前进一步，这样可使全世界人民看了以后放心，知道我们搞的是什么东西。当然搞这么一个条约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必需的、有利的。”<sup>④</sup>从1974年9月26日开始至1975年，在周恩来的指导与推动下，中日两国之间多次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相关问题举行会谈，但由于反霸问题上的分歧一直搁浅。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成为周恩来未竟的心愿。

同样立足于国际立场的池田大作认识到，21世纪的人类应当争取的方向是“纵的方面要立足于人的存在的根源——生命的存在；在现实的行动上，横的方面要结成共同具有这种生命的存在地球人类这一普遍的团结。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扩大地球人类这一普遍的团结，在我们的地球上消灭一切战争，建立平等互惠的地球社会，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人道主义运动的伟大目标之一。”<sup>⑤</sup>真正的和平社会是把恢复人的生命尊严作为第一要义，敬重生命，并在此基础上，全世界人类都能够相互尊重，超越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认识到不同肤色之下藏着相同的人性，使人类从相互憎恶、敌对走向信赖、友好。池田大作进一步指出：最高的和平状态应该是要达到“灵魂和精神的文明状态”<sup>⑥</sup>，使“每一个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4—496页。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4-495页。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页。

<sup>④</sup> 张香山：《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后》，《日本学刊》，1998年第4期，第1页。

<sup>⑤</sup> 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sup>⑥</sup> 裴彻、[日]池田大作：《为时未晚》，淑馨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人都光辉灿烂”<sup>①</sup>这样一种社会和谐与繁荣、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的终极状态。他说，“以后的人类应该要互相尊敬，互相学习，朝着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前进<sup>②</sup>，树立一种“全球性的命运共同体意识”<sup>③</sup>。池田大作从生命尊严的角度出发，也认为21世纪应该是生命尊严的世纪、和平的世纪，为此，人类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没有战争与暴力这一消极的和平，而是一种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联结在一起，把人类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这样达到一种共生状态的积极的和平。他曾对积极的和平做过精彩的评述：“我们人类需要重视的问题，并不仅仅要实现没有战争的消极和平，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威胁‘人类尊严’的社会构造，实现积极的和平。”<sup>④</sup>在池田大作看来，真正的和平社会是把恢复人的生命尊严作为第一要义，敬重生命，并在此基础上，全世界人类都能够相互尊重，超越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认识到不同肤色之下藏着相同的人性，使人类从相互憎恶、敌对走向信赖、友好。池田大作进一步指出：最高的和平状态应该是要达到“灵魂和精神的文明状态”<sup>⑤</sup>，使“每一个人都光辉灿烂”<sup>⑥</sup>这样一种社会和谐与繁荣、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的终极状态。

在池田大作的视野中，中日关系的世代友好是世界和平的前提与基础，实现世界和平则是中日世代友好的目的与归宿。正如池田大作曾明确说明的：“在督促官方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考虑的是中国和日本在人类所取得的成就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我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中国和日本必须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此后两国必须在亚洲建立和平的事业中充当先锋，并期望每一个亚洲国家都参与这一事业。因为这是我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哲学，虽然听起来这一想法过于大胆，但我很早就就是中日恢复邦交事业的举旗之人。”<sup>⑦</sup>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以后，池田大作就把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作为中日友好事业新阶段的新目标而继续努力。1975年4月池田大作第三次访华前后，曾多次同当时担任副首相的福田纠夫会见，把自己主张缔结条约的信念告诉他，并把访华期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关于中方反对霸权和缔约立场转告给他。经过池田大作的转告，日本政府及时了解到中国政府的态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又重新开始缔约谈判。与此同时，池田大作还不辞辛苦，出访美国、苏联，与该两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终于，在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正如邓小平所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这个条约是由周恩来总理设计，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同日本缔结的。条约的缔结体现了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和日本民间力量的巨大作用，尤其是池田大作及其创立、指导的公明党在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sup>①</sup> [日] 池田大作：《希望的对话——给21世纪的青少年》，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79页。

<sup>②</sup> 池田大作、杜維明『対話の文明』第三文明社2007，141～142頁。

<sup>③</sup> 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sup>④</sup> 《聖教新聞》，2000年1月26日。

<sup>⑤</sup> 裴彻、[日] 池田大作：《为时未晚》，淑馨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sup>⑥</sup> [日] 池田大作：《希望的对话——给21世纪的青少年》，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79页。

<sup>⑦</sup> [日] 池田大作：《池田大作集》，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可以说，这种人类情怀贯穿周恩来、池田大作对中日和平友好事业所做贡献的始终。因此，周恩来与池田大作所致力中日友好事业，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具体结果之上，而是着眼于时间维度的中日世代友好和空间维度的世界和平，二者纵横交织，蕴含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照。

### 三、在推动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事业中取得实效

从宽阔的人类视野出发，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均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中日世代友好作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在身患重病之际，周恩来特意会见池田大作，希望他继续推进中日世代友好事业，为建立以平等的立场互相合作的人类社会而奋斗。池田大作牢记周恩来的嘱托，坚定地以日中友好为根基，为构建文明共生的和谐世界而持续奋斗，从而呈现出周恩来、池田大作为人民的思想底蕴与为人类的博大情怀之间的深层内在关联。

1974年12月5日，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坚持在北京三〇五医院会见池田大作。在会谈中，周总理亲自表明了‘我不能不见你’的理由。周恩来说：“池田会长一再提倡必须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我对此感到很高兴。创价学会和公明党都为这一目标积极奔走，这符合我们的共同愿望，中日友好能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我们双方还要继续努力下去。”<sup>①</sup>同时，周恩来对于池田大作及其所领导的创价学会长期以来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并且充分肯定了池田大作一贯对华友好的态度及其所创建的公明党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后，周恩来又满怀深情地说：“20世纪的最后25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要彼此站在平等的立场，互相合作，共同努力”。<sup>②</sup>周恩来还特意对池田大作说：“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同您交往。”<sup>③</sup>池田大作回忆道：“会晤中，我始终浑身感受到总理不可斗量的气魄。他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精神力，可以一口气谈上一两个小时。”<sup>④</sup>“总理谈及许多方面，但当中一贯的是对二十一世纪的热切展望。当时，总理心里想的是自己死后的事。”<sup>⑤</sup>在会见中，池田大作“再三地希望周总理保重身体，认为‘这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sup>⑥</sup>有着共同人类情怀的他们，“相见虽晚，相知甚深”<sup>⑦</sup>。林丽韞后来回忆说，刚刚见面时，池田大作“用手抓住总理的臂肘，象拥抱似地握着总理的手。总理也深情地凝视着池田先生，始终是一副打内心里感到高兴的神情”；在会谈中，“他们俩开怀畅谈，简直令人觉得不是初次见面。”周恩来仿佛“是在向池田先生托付中日友好交流的重任”。<sup>⑧</sup>

<sup>①</sup> 王永祥主编：《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sup>②</sup> [日]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第13卷），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6页。

<sup>③</sup> [日] 池田大作：《我的世界交友录》（第1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sup>④</sup> [日] 池田大作：《清流甘泉 与世界智者晤谈》，华社研究中心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sup>⑤</sup> [日] 池田大作：《清流甘泉 与世界智者晤谈》，华社研究中心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sup>⑥</sup> 李庆：《池田大作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sup>⑦</sup> 林丽韞：《回忆周总理与池田先生的会见》，《国际创价学会画报》，1997年7月。

<sup>⑧</sup> 林丽韞：《回忆周总理与池田先生的会见》，《国际创价学会画报》，1997年7月。

1974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周总理会见池田大作等日本朋友 同池田大作会长和夫人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的专题文章。同时还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与以池田大作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二次访华团全体团员的合影照片。

这次短暂的会谈,给池田大作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周恩来抱重病之躯,坚持接见自己,在感动之余,池田大作深感责任重大。他深信,这是周恩来在生命之火熄灭前,豁出性命向年轻的一代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中日世代友好、万代不战保卫和平”<sup>①</sup>。周恩来的托付,使池田大作感到肩负着促进中日友好的重大责任,“在心中深深发誓要对中日两国的友好、亚洲民众的幸福作出贡献。”<sup>②</sup>他多次表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我都要为中国人民尽一份力。这是我的信条,也是我对周总理的誓言。”<sup>③</sup>在池田大作看来,“‘以民促官’——这是总理对日本的一贯方针,不管何时何地,他始终将中日友好的基础放在以民众为根本的方针中。”<sup>④</sup>基于对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的深刻理解,池田大作强调,中日关系只有“在更深层的民众意志受到重视之下而进行交流,才能加深真正的相互理解。”<sup>⑤</sup>此后,池田大作访华多次,他所领导的创价学会、创价大学<sup>⑥</sup>等机构也成为中日友好的重要阵地。

自1974年5月实现第一次访华至今,池田大作十次访问中国大陆,为建立巩固的日中友好“金桥”而亲历亲为。池田大作访华日期及地点如下:

第一次访华	1974年5月30日 ——6月14日	中国大陆
第二次访华	1974年12月2日 ——6日	中国大陆
第三次访华	1975年4月	中国大陆
第四次访华	1978年9月	中国大陆
第五次访华	1980年4月	中国大陆
第六次访华	1984年6月	中国大陆
第七次访华	1990年5月27日 ——6月1日	中国大陆
第八次访华	1992年10月	中国大陆
第九次访华	在1994年1月30 日——2月1日	中国大陆

<sup>①</sup> [日] 池田大作著:《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 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第38页。

<sup>②</sup> 《黎明圣报》, 2004年11月8日。

<sup>③</sup> [日]池田大作:《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讲演、随笔集》, 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第130页。

<sup>④</sup> 王炳根:《与池田大作对话》,《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7期, 第75页。

<sup>⑤</sup> 《黎明圣报》, 2004年6月21日。

<sup>⑥</sup> 创价大学于1971年4月2日建成开学。宗旨在于培养具有崇高人格、卓越学识、丰富教养的人才。其建校精神有三点:成为人本教育的最高学府、成为新式文化建设的摇篮、成为坚守人类和平的要塞。

第十次访华	1997年5月	中国大陆
-------	---------	------

池田大作十次访华日期表

为完成周恩来的托付，作为一名社会人士，池田大作多方位、多举措的搭建中日友好交流新平台，不断推进中日两国的文化、教育等交流。在此过程中，不仅促进了中日友好和平事业的发展与世界和平事业的进步，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恩来、池田大作致力于的中日和平友好事业体现着尊重差异、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共创未来的精神内涵。其中，尊重差异是“周池精神”的前提与基础，民众间的平等交流是基本途径，互相学习是基本态度，共创未来则是目标追求。“周池精神”不仅是指引着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